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邓力群同志报告摘要)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

耀邦同志、文彬同志要我到中央党校来讲课，我心里很胆怯。能够给同志们有一点贡献的，是一本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记录，一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这两本记录我有机会比同志们接触的多一点，稍微比同志们熟悉一些。所以凭着这么一点，觉得有了一点胆量来和同志们谈一谈。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记录，是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时做的谈话指示。一九七五年我们找到了流传比较广的几种记录稿，后来又从经委找了一份整理铅印的记录稿，进行了核对，做了整理，就是现在印发给大家的本子。这次会议我没有亲自参加，只是听了传达。这份记录虽然是根据几个版本整理的，有些问题把握不大。在座的同志中可能有听过这次会议的传达，可以回忆一下，中间是不是有不准确的地方。我听传达的时候，曾经听到毛主席有这么一句话，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可是我们搜集到的各种记录本都没有这句话，所以没有把这句话整理进去。象这样遗漏的地方，一定是不少的，不准确的地方也可能有，希望同志们学习的时候注意一下。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开始，延续到一九六〇年春节以后读完，中间插了一个上海会议（一九六〇年一月间）。从头到尾我都参加了，参加的还有胡绳同志、田家英，以及陈伯达。读书的方法，一边读一边议。每天下午读半天，三个多钟头，有时四个钟头。上海会议以前在杭州已经读了大部分。上海会议我们都参加了。会后又到广州白云山继续把没有读

完的读完了。毛主席曾经指定要胡绳、田家英、我三个人轮流一页一页、一段一段地读原书。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这次读书是很难得的机会，毛主席一定会讲出很多很好的意见，应该想办法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三个人作了一个分工，由胡绳、田家英读，我专门记。开始读了几天，毛主席发现胡绳读了田家英读，田家英读了胡绳读，就是没有听到邓力群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啊，你不读，你只是记啊。当时我哼了一句：嗯。他没有指责，没有批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记毛主席的讲话，没有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他是看到我专门记的，这个记不是不合法，这一点同志们可以放心。我们读完以后就进行整理，杭州读完的部分，在杭州就整理出来一份记录稿。这个整理的记录稿经胡绳看了，田家英也看了，他们作了一些核对、校正。因为当时记，当时整理，又是经过核对的，这个记录稿是比较准确的，这一点同志们也可以比较放心，是可以信得过的。到上海会议，我把这一份整理稿送给了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打字油印了五份，送给当时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其中送毛主席一份，周总理一份，朱总司令也送了一份。在上海会议上，都知道毛主席读这本书，纷纷提出要求，在会议上进行传达。在毛主席面前也提出了要求，毛主席曾经表示可以传达。我所在的组是西南组，当时朱总司令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大家要求我传达，我还有一点不敢，因为我没有直接听到毛主席讲可以传达。后来朱总司令、邓小平同志讲，可以传达嘛。这样我在西南组的会议上作了传达。所以这个传达应该说也是合法的。后来到了广州，读完了，周总理召集了国务院工交、财贸单位的第一把手在广州从化读这本教科书，指示胡绳把我们整理的记录稿选编一下，把其中最重要的选出来，稍加整理印发给到会的同志。印发这个稿子总理是

不是请示过毛主席，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理这个人一向很慎重，据我估计，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在从化读书，毛主席是知道的，印发这个东西总理会向毛主席讲（范若愚同志：说过）。胡绳同志选编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曾经过中央办公厅印发各省、大军区、中央各部委，一个单位二份，读完以后正式收回来了。发到各地方的原件虽然收回来了，但下面在收回以前抄录甚至翻印了。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抄出了。所以中央印发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就在社会上散发开来，很多同志都看到了。这是胡绳选编的，和我原来的当天记当天整理的基本内容一样，但是份量有不同。我们当时记录整理的大概有六、七万字，胡绳选编印发的大概四、五万字，少二万多字的样子。到了一九七五年，纪登奎同志指示我们四个人（我、胡绳、吴冷西、于光远同志），把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重新整理一下，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进行了一次整理。这次整理依据的东西有这么一些：一个是我的原始记录。一个是整理的记录。还有一个是读书的时候每个人手边有一本书，读的过程中毛主席在书上作记号，一边读一边用铅笔划，有一些重要的话划了铅笔的杠子，因为读书坐的很近，我看到主席划也跟着划，有那一句，那一个观点，读的中间毛主席说这个意思很好，或者这个观点对，毛主席说了，我就记在书上，这个没有记在我的记录本上；这样比我们记录整理稿内容更多，其中虽然只有一句话，或者只是表示对不对，只是一个字，或者二个字，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读的过程中对这本书那些段落、那些提法是一个什么态度。那一本书原来抄家抄走了，后来退回来了。第四个是我一九六〇年春节回到北京以后，曾经在宣传、文教口作过一次传达，于光远同志做了记录，他的记录做得很好。我在传达的时候基本部分是记录

整理稿，同时也把刚才说的在书上记住的一句话或一个字、二个字而没有整理到记录稿里面的部分也传达了，传达的比较详细。因此他那个记录稿也比我那个整理记录稿详细。有这样四个原始资料，加上胡绳选编的流传比较广的那个，用这些作基础进行整理，整理到后来，我们估算了一下，全文大概有九万多字，接近十万字。整理完了以后送给了纪登奎同志，他后来印了四十份，一直保留在国务院。一九七五年整理记录稿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找出一本来，旁边划了杠的，就给它划上杠，毛主席说对还是不对的地方就写在旁边，对这一段有议论的，就把毛主席的议论整理在后面，用这种方法进行整理，比较完全地保持了毛主席读书时候的一些意见，一些态度。当然这中间肯定会有遗漏，也一定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总的说来是比较完整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几个同志，后来又有几个同志感到有必要搞一个索引，因为这个书很厚，毛主席在什么地方讲到了什么问题，一下子不容易查，后来把毛主席的各种论点，包括一句话两句话表达出来的论点，大大小小的论点，一个一个地摘出来，做了一点分类，稍微做一点排列，这就是印发给大家的这一本书，叫做论点汇编。毛主席的大小论点，这本书里可以说都完全了。因为经过排列，同类问题集中在一块了，学习起来比较方便。但是次序和毛主席读书时讲话的次序完全不一样。

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搞好以后一直保存着没有传出去，这次耀邦同志、文彬同志找我，要我来讲这个问题，我就把这本书送给耀邦同志了，简单讲了一下方才说的前后整理的情况。我说，要印发，犯法不犯法，我不管，他说他负责。所以决定在党校印发，是耀邦同志负责。但是也建议同志们，如果带回去，请同志们负责好好保

存，不管到那一级党委，如果他们想印发，请你们招呼一声，不要印发，印发太宽了，流传出去不一定好。

我讲的问题，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谈一下毛主席读两本书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讲一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讲一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第一部分，毛主席读两本书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八年，我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使农村从高级合作社转向了公有化程度更高、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它的客观根据的，可从两个方面看：

一个方面，高级合作社在全国完成以后，大大解放了原来受到束缚的农业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发展又要求把农村高级社更向前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符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农村普遍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即土地需要调整。因为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全部土地，富农的多余土地，分给贫农、下中农，是按照地主、富农的地在那里就分在那里，那个村子的农民得到了这个村子的地，这个村子的农民得到了那个村子的地，互相交叉。在个体经营时问题不显著，无非是走得远一点。合作化以后，要规划生产，组织生产，需要在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合作社范围内把土地统一规划、统一经营，需要把插花地进行调整。初级合作社有这个问题，高级合作社更有这个问题。因此，有的队或社需要适当合并。还有，在高级合作社以后，出现了全国生产的大跃进，农村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

建设运动，河流的调整，沟渠的建设，都发生了上流要受一些损失、下流才能得到一些益处的情况，在社与社之间、队与队之间产生了矛盾，要求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来进行规划，受益的怎么帮助那些受损失的。还有，在大跃进中很多地方要求举办当地能够举办而且必需举办的各种小型工业。原料、市场、技术这些条件都具备，办了对那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会带来好处。可是这些事情一个高级合作社做不了，需要几个高级合作社联合起来才能够办成。还有其他一些事业都有这样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采取一种形式，使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在公有化的水平上提高一步，经营规模上更扩大一些。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普遍地实现，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毛主席讲过，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够，还需要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随后在全党范围内展开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全党的整风运动，全国的整社运动，就是毛主席上述理论的具体实践。这个革命确实大大提高了全国城乡人民、全党的社会主义觉悟。集中概括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面貌的是毛主席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很短，但是对于当时进行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就给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好了准备。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指引下出现的大跃进，出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是我国人民生活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也确实出现了新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的同志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确实不

够。同志们回忆一下，一九五八年我们的心情，确实兴奋的不得了。可是在兴奋中间我们都有一点头脑发胀，所以产生了很多过急的东西。当时普遍议论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要比原来设想的速度不知道高多少，我们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我们可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进入共产主义问题上，城市的老大哥工人阶级落后了，农村的小弟弟农民走在前面去了。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高级社要求适当扩大它的规模，可是有些地方规模就大得不可想象了，一个乡二个社，甚至于一个县一个社。既然是共产主义，因此也不要分你的我的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这个村子的粮食可以调到那个村子，那个村子的蔬菜可以调到第三个村子，出现了“一平二调”。生产发展较快，生产的東西较多，生产队、大队卖粮食、卖棉花、卖蔬菜很多，钱很多，认为过去的农贷可以全部归还了。所谓“一平二调三收款”到处出现。还有全民办钢铁，全民办工业，全民办交通，全民办卫生，那个时候全民办的东西多得多。我们一九六一年到广东参观调查，顺德县建设了一个人民大会堂，规模只比我们的人民大会堂小一点，完全是照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这个大会堂是全县各个公社社员出劳力、出材料盖的，全民办嘛！根本不承认这个财产这个劳动力是公社生产队的，都是共产主义了嘛。毛主席曾经讲，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同时也是农林牧副渔互相结合的社会基层组织。由于对这个指示领会、学习不够，有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每一个公社都要实行自给自足，凡是自己能生产的東西都归自己消费，自己需要的東西都由自己生产，每一个公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全民普遍实行供给制，有的说是五供给，有的甚至于十供给，生老病死，从一出生到死各个方面都要管起来。这些事情全国到处都发生了。

另外方面是浮夸风，一亩地几千斤，上万斤，几万斤，放卫星，互相比赛。这些，现在看起来、听起来是笑话，但是应该说，我们当时许多在局势中间的人是真心诚意的，是一种革命的热情。我们入党的时候都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现在看到共产主义来到了，大家都为之欢欣鼓舞。这种情绪，这种感情应该说是可贵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终究不能靠激情办事，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

在这个时候，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利用我们没有经验，利用我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出来宣传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宣扬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可以不要商品生产了，可以直接进行调拨了。实际工作中间的偏差只要指引一下，是容易纠正的，但这样一种理论出现以后，影响更多的人，可以使人迷途，一下子很难转变过来，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毛主席把陈伯达这个人抓住了。

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十月毛主席到了天津的杨村，召集一些同志开了一个调查会，参加会的有一个人是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这个人后来不好了），他当时在毛主席面前把徐水的共产主义说得天花乱坠，什么共产主义新村到处涌现，粮食产量高到简直不可想象的程度，又说他们全面实行供给制了，多少个不要钱都已经成为现实。毛主席听了这个汇报以后，具体问了一下实行供给制的情况，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有个家庭（现在记不得那个家庭的名字了），两口子，都是“壮丁”，只有一个小孩，两个劳动力只管一个小孩；另外一个家庭一个劳动力，老老小小管五口人。毛主席就问他，这样不同的劳动家庭怎么分配呀？他说一样，都是按人口平均，按照我们的供给标准孩子应该供给什么就供给什么，老人应该供给什么就供给什么，青年应该供给什么就供给什么，壮年应该供给什

么就供给什么。毛主席给他算了一个账，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劳动力多人口少的人吃了亏，劳动力少养活家庭人口多的人大占便宜。这很清楚，一个劳动力管五个人，都按照供给制分配，他得到六份，一个劳动力得到六份。另外，两个劳动力只管一个人，按照人口分配，得到三份，他的贡献比那家庭多一倍，而得到的比那家庭少一倍。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毛主席就讲，这样一种供给制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不会带来好处，相反会带来坏处。那谁还想干？反正我人口多你照样供给。从杨村发现问题以后，沿着河北省平汉线向南走，一路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毛主席都发现了。因此立即在十一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各省、市委书记都到会了。

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抓到了陈伯达，写了一封关于建议读书的信，而且亲自领导到会的人逐章、逐节、逐段、逐句地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对陈伯达讲（信里讲，口头上也讲），我们有一些经济学家，平常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一遇到实际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折扣了。这里头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存在的条件下究竟要还是不要？这个问题就是承认不承认每个人民公社每个生产队的生产资料是不是集体所有？它的产品是不是集体所有？如果承认它是集体所有的，又无偿地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不搞剥夺，就必须实行商品交换，他愿意卖就卖，不卖就不能把它要过来。这个问题在实际问题上理论上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抓住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抓住，其他一系列的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也解决了。既然还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就应该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要不要划？既然是实行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制也要

划界限，到了共产主义总不能再进行商品生产。划了这些界限，我们的政策也就跟着出来了。所以，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争论，这样一个斗争，对于我们当时人民公社的巩固，工农联盟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抓不住这个问题，听任陈伯达一套谬论广为散播，初升的人民公社肯定要受到很大的破坏。现在看起来，毛主席的话如果不深思，好象都很平常，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算过高的。

接着在武昌开了中央全会，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由乔木同志执笔，经过中央全会讨论通过的。我建议同志们重新学一下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批驳了陈伯达的谬论，把毛主席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从根本上作了阐述。这个决议一传达，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头脑清醒了，接着下来是具体政策怎么贯彻执行的问题了。以陈伯达代表的这样一个危险倾向，扭转过来了。有了这个决议以后，毛主席继续调查农村问题，感到有很多政策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所以一九五九年三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内部有三级所有制的问题。由三级所有制到人民公社所有制是一个过渡，有一个过渡时期。不仅划清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第二次郑州会议又进一步划清了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界限，而从小集体到大集体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着急。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是乔木同志根据毛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的，建议同志们重新读一下。随后到了一九五九年五、六月上海会议，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十八条，就是根据第二次郑州会议划清大集体、小集体的界限提出十八条。

本来毛主席准备在那一年的庐山会议上领导大家来读两本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读书的过程中，结合实际总结经验，进一步讨论制定各项政策。在会议上彭德怀出来了，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干扰，使得书没有能够读，原来的议程被打乱了。

毛主席一直关心怎么总结已有的经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重新找了几个同志同他一块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在读书的谈话中对于怎么搞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发表了很多具有创造性的意见，确实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苏联的经验（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肯定了应该肯定的，批判了需要批判的。有的同志曾经讲，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可以同《哥达纲领批判》相比拟，具体指明了一些怎样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对于怎么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总结我们自己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对于批判“四人帮”制造的理论上的、思想上的、政策上的混乱，都是非常重要的武器。很多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过去脑筋里面想不通的问题，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谈话，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关于历史背景就说这么一点。

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问题

毛主席谈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内容很多，这一次主要是讲一讲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问题。

从十月份起，我们几个同志编了两份材料，一份材料是《“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一份材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几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在编“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之前，我的印象，“四人帮”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制造了不少混乱，但是很零碎，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对于社会主义的事业看到这个不顺眼攻击一通，看到那个不顺眼攻击一通，没有一个体系。编选了这个材料以后印象改变了。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确实有一个系统的反动的理论，集中的表现是对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攻击、诋毁。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的系统的谬论，是他们的反动的经济纲领。他们在反动的经济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动的政治纲领。我们写的文章对其中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批驳。这篇文章分四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第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第三，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产生的吗？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不能说我们的意见都是对的。但是，既然我们这样看，就提出来，不掩盖自己的观点，供同志们讨论，也希望听到同志们的批评。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把问题搞得更清楚。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曾经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斗

争。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陈伯达鼓吹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按照陈伯达的观点去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在这一次斗争中，毛主席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这对于巩固人民公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次斗争是王、张、江、姚“四人帮”挑起的，“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本来就是一伙，他们在新条件下采取更狡猾、更阴险、更恶毒的手法，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理论，丑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现实，妄图毁灭我国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散布的谬论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通过对“四人帮”的批判，澄清混乱，肃清流毒，同时还要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探讨，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这两次斗争，陈伯达采取的手法是：我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啦，我们要从集体向全民过渡啦，商品生产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啦，我们应该往前看，不应该留恋那些旧的东西呀。“四人帮”的手法是败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名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信心，把一切罪恶归之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说一切坏东西都是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来的。他们煽动要“革命”，革什么命？他们认为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革掉。手法不同，目的是一个，取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是两种公有制存在的条件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为什么要突出地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一个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历史很长，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过商品生产。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看到这些不同社会形态下商品生产的共性，更要看到不同社会形态下商品生产的特点。不同社会里面的商品生产的共同性，按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头的说法，商品是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是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至于不同所有者是公有的，私有的，这不是共性。拿社会主义来讲，一种是集体所有制生产的产品，一种是全民所有制生产的产品，我们现在也还有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的产品。所有者的性质不同，但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买卖，可以转让所有权，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面都是一样的。只要有商品生产就有这样一个共同点。既然是商品，它就有价值。价值由什么规定呢？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来规定的，不管那一个社会形态都一样。不管那个社会，商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所以不同社会形态里面的商品都有共同点，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这个共同性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有一个科学的术语，叫做生产一般，就是讲的不同社会形态里面生产的共同性。这个科学的抽象，对商品生产也适用。

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社会里面商品生产的共同性是必要的，可是研究不同商品生产的不同点，或者叫特殊点，或者叫特殊本质更加重要。马克思说找到共同点，但不要忘记它们的不同点，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只看到共同点，忘记它们之间的差别，这不是科学的方

法。只看到共同的东西，不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好比只看到商品生产是能够转让所有权，认识停止在这一点上，你能够理解不同社会里面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吗？不能。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毛主席这一段话，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性的思想。

“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所采取的方法同毛主席说的方法完全相反。他们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资本主义以前小商品生产的特点，说成是所有的商品生产的共同特点。或者说，他们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说成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一样的东西。在《“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中有这样的话：商品内部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商品生产自发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稍不小心就很可能上他们的当，可是认真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方法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生产内部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商品生产自发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不是所有的商品生产的共同点，而只是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的特征。从商品内部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能不能得出必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呢？不能。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然后进一步分析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进一步又分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个矛盾是以什么性质的劳动为基础。小商品生产里面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是以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商

品的劳动也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重性，可是这个劳动已经不是私人劳动而是全民或集体的公共劳动。“四人帮”完全回避这一点，只讲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我们认为光是分析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还不够，还要分析这个具体劳动是私人劳动还是公共劳动。只有以私人劳动为基础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才导致资本主义，正象历史上的小商品生产在封建社会末期导致资本主义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四人帮”还有这样的说法，只要存在商品制度，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这也不是什么一切商品生产的共同点。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制度，才必然存在着资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制度，就不存在资产阶级。原始公社末期有商品制度，那里存在资产阶级吗？奴隶社会有商品制度，那里存在资产阶级吗？封建社会小商品生产没有达到一定的条件以前，那里有资产阶级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斯大林叫作特殊的商品生产，存在资产阶级吗？

“四人帮”把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这些商品生产的特殊形态硬说成是商品生产一般，说成是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的东西。这是资产阶级学者的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曾经把资本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他们根本抹煞或者有意掩盖马克思所揭示的这样一个真理：生产资料只有被用来支配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时候，才变成资本。象农民、自耕农也有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不是资本。原始社会的人用石刀、石斧来进行生产，这也是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能叫资本吗？不能。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则说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一切社会里面的生产资料都叫资本。用这个来证明